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

郭运德 王杰 李心峰 主编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

李云雷 著

EXPLORA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LITERATUR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

郭运德 王杰 李心峰 主编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

李云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李云雷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1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

ISBN 978-7-5190-3975-2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4636 号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

作 者: 李云雷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曹艺凡

责 任 编 辑: 邓友女

责 任 校 对: 甄 飞

封 面 设 计: 马庆晓

责 任 印 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78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dengyn@clapnet.cn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 顾 问: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 书 如 有 破 损、缺 页、装 订 错 误, 请 与 本 社 联 系 调 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6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3975-2

定 价: 72.00 元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划)

王元骧 王伟光 刘纲纪 李正忠 李 淮 吴元迈
张 江 陆贵山 董学文

主编

郭运德 王 杰 李心峰

编委

王 杰 党圣元 郭运德 谭好哲 陈飞龙 丁国旗 马建辉
朱 庆 朱辉军 李心峰 张永清 张政文 金永兵 周由强
庞井君 胡亚敏 祝东力 奚耀华 赖大仁

项目策划

朱 庆

执行策划

邓友女

项目编辑

邓友女 冯 巍 张兰芳

目 录

我们为何而读书?	1
我的“问题意识”及其形成	12
“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及其探索	18
——读刘继明的《入境》	
中国工人的“史诗”	29
新工人诗歌的“崛起”	32
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	35
——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在新的时代如何讲述抗战故事	39
——读范稳的《重庆之眼》	
重新进入历史与故乡	42
——读蔡家园《松搏纪事》	
“新工人美学”的萌芽与可能性	48
——《2013 新工人文学奖作品集》序	
新小资的“底层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56
“为谁写作”：命题的提出	62
回馈乡村，何以不可能？	66

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	69
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	78
——简评《钢的琴》	
“我们坚持自己艺术梦想的道路不会改变”	83
——张猛导演访谈	
看不到的“铁人”	92
抵达中的逃离，贴近中的遮蔽	98
——贾樟柯《二十四城记》观后	
如何重新讲述革命的故事？	101
——电影《古田会议》观后	
《白毛女》：风雨七十年	103
《智取威虎山》：文本与历史的变迁	111
论浩然的“自传体三部曲”	115
重温《青春之歌》	123
关于《我的阅读史》的答问	126
——洪子诚教授访谈	
陈映真是一面精神旗帜	138
日本的“《蟹工船》现象”及其启示	141
肯·洛奇的双重挑战与超越	149
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	160
赛珍珠：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172
查韦斯：“我们是逆境中的斗士”	184
你好，卡米拉！	194

附录：历史与当代经验中的个人

201

——李云雷访谈录

目
录

CONTENTS

Why we read?	1
My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its Formation	12
Possibility and Exploration of “New Socialist Literature”:	
On Liu Jiming’s Human Boundary	18
“Epic “of China Workers	29
“Rising” of New Workers’ Poetry	32
“Losers” of the Globalization Era: On Shi Yifeng’s “There is no Chen Jinfang in this world”	35
How to Tell Stories about War of Resistance: On Fan Wen’s “The Eyes of Chongqing”	39
Entering Again into History and Hometown: On Caijiayuan’s “Events of Songwan”	42
Sprout and Possibility of “New Workers Aesthetics”: Preface of “The 2013 New Workers Literature Awards Works Collection”	48
The Underclass Evolution of New Petty Bourgeois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Leadership	56
“Who We will Write for”: Proposition of Question	62
Feedback to the Village, Why Cannot this be Possible?	66

Chinese Films: The Underclass Narration of “Blockbusters Age”	69
Workers’ Lif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New Possibilities:	
Brief Criticism on the Film “The Piano in a Factory”	78
“We will not change our faith about insisting our own art dreams”:	
Interview with Director Zhang Meng	83
“Iron Man” Who Cannot be Seen	92
Escaping in Arriving, Sheltering in Closing:	
On Jia Zhangke’s “24 Cities”	98
How to Retell Stories about Revolution: on Film “Gutian Meeting”	101
“The White-haird Girl”: On Its 70 Years	103
“Taking Tiger Montain By Strategy”:	
The Transition of Text and History	111
On Hao Ran’s “Autobiographical Trilogy”	115
Review of “Song of Youth”	123
Interview Prof.Hong Zicheng: About the Answer of	
“My Reading History”	126
Chen Yingzhen is a Spiritual Flag	138
Japan’s “Crab Factory Ship” Phenomenon and its Inspiration	141
Ken Loach’s Double Challenges and Transcendence	149
Helen Snow: “The Searcher of the New World”	160
Pearl Buck: How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172
Chávez: We are Fighters of Adverse Situations	184
Hola,Camila	194

Appendix Individuals in Historical and Modern Experiences:

Interview with Li Yunlei

201

我们为何而读书？

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10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挨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儿，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他也

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他则成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

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 6000 块钱，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 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骄子，对毕业后的生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大学 30 年来出身于农村的学生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人不得不反思。

二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一

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从新东方学校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更“中心”的地区，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高处”，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这成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同样在国内，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农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父母好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农民，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尾巴”。他们在城市里被人看不起，因为是农民的子女，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但认为是“正常”的，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父母与乡村，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让一个孩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到城市里待了几年，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做人、做事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不靠谱儿”，于是村里人议论纷纷，感觉这孩子“学坏了”，很是痛心。

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将平心而论，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视角，或者说是在一种“文明与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一种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愚昧”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反思，说农村或农民没有“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偏见的，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如果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这种文化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只是

由于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

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这些国家又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限于“现代派”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模仿的对象，成了“公共话题”，似乎不谈他们就不“先锋”，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外文学的长处，而是觉得这种风气、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外国”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也拥有对学术话语、媒介与评价体系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为什么没有印度？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尤其是，为什么没有俄罗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在我的视野中，除了社科院张婕的两本著作之外，很少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眼光也未免太势利了，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关注的是“弱小民族国家”，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但我们却不愿正视，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中心”。其实在张婕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似。“自由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对文学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等等，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而我们没有被冲垮。如此相近的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但我们却轻易地放过了。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

文学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水浒传》这类与关于农村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而当我再看关于农村的作品时，总会觉得它们太土、太落后，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这样一种建立在西方文学阅读之上的“修养”，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同时对文学“纯粹性”的专注，也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农村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也不怎么关心作者为什么要创作，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过的——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重新认识文学，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写作，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者在世界中看文学，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而这不能不从对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始，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我之所以关心“底层文学”，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底层文学”正好构成了我关注的两个领域——“底层”与“文学”的一个交集。

三

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在关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层”的处境尤其值得思考。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精英垄断”。中国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或“新阶层”）、学者，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或者所谓的“铁三角”，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垄断，不仅在现实中损害着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

的利益，而且试图将他们的“垄断”永久持续下去，这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所产生的弊端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这种垄断的局面下，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如今，不仅传统的“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中产阶级与“白领”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在分化与瓦解。最近出版的《蚁族》一书，描述了“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大学生群体已经越来越沦为“底层”了，高等教育也不能改变底层青年的命运了，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出身，而不是知识，这是我们的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表现。如果底层青年的一切出路被堵死了，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那么我们的社会至少是不安定的。

另一方面，就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说，对“个人奋斗”“竞争”“成功”的神化，唤起了青年人对精英生活的幻想，在他们的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而进入“精英”阶层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也不断强化他们这一想象。但在现实中，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也在压制“准精英”。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个人奋斗”和“竞争”去成功，则难免会有“白日梦”幻灭的时候。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无法改变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命运；其次，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奋斗”的起点是不公平、不平等的，每个人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即使一个底层青年去“奋斗”，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最后，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有“个人奋斗”的空间，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了。我们必须抛弃“个人奋斗”的幻想，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底层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关注底层与底层青年的命运，因为底层的命运不仅只与底层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就我个人来说，置身于现实之中，精神上常会有迷惘与被撕裂之感。我在乡村生活了18年，而在城市里也快到了同样的年数。但是我既已无法回到故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我在一篇